

支持率下滑趋势明显已达组阁以来最低水平 高市早苗计划9月末改组内阁

□ 江永翔

近日，多家日本媒体的全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下滑趋势明显，已达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据悉，为挽救低迷的支持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意在9月末改组内阁，其中多个关键位置的人事安排成为焦点。此外，执政联盟日本维新会也存在派员入阁的可能性。分析指出，这一关键调整或将影响日本未来政坛格局，更关系到未来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走向。

支持率持续走低

日本共同社8月22日和23日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50.2%，较上次7月调查时下跌3.5个百分点，创高市内阁去年10月成立以来新低。同时，据日本《每日新闻》18日报道，7月进行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自民党支持率为23%，较6月下跌4个百分点，同样降到了最低水平。

舆论分析认为，高市内阁支持率与自民党支持率双双下降，主要原因在于近期高市早苗在经济民生政策、扩军修宪动向等方面的争议举措。

面对日元持续贬值，物价居高不下的经济困境，高市早苗计划自2027年4月起的两年内，将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降至1%，消费税用于日本社会保障，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核心组成部分，但高市早苗始终未明确说明减税带来的财政缺口将如何弥补。同时也有意见指出，消费税降低的效果很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所抵消，且两年后恢复到原税率，或将对经济与政治造成重大影响。针对政府决定实施消费税减税，有71.7%的受访者对财政状况感到担忧。

另一方面，自高市早苗上台执政以来，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设立国家情报局等扩武备战举措，标志着日本正在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重塑战后军事框架，受到日本国内和平进步人士的持续抗议，越来越让日本民众感到不安。

此外，《朝日新闻》报道中提到，日本执政党不顾在野党意见及日本民众呼声，在国会中强行通过法案的强硬姿态，让自身形象大受影响。“高市早苗作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国民对其‘走出不一样施政路线’抱有极高期待”，如今，这样的期待正在逐步落空。

派系博弈成焦点

当地媒体报道称，高市早苗已着手研究改组内阁及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以展现革新姿态挽回持续走低的支持率。据《日本经济新闻》透露，关于高市早苗进行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的时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普遍认为，主要时间窗口为9月中旬，这也将是高市内阁上台后的首次改组。



由于在经济民生政策、扩军修宪动向等方面的争议举措，高市内阁支持率创历史新低，图为当地时间8月19日，日本民众在国会对面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在自民党内部被视为焦点的是干事长的人事安排。现任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出身于自民党内“麻生派”，同时也是副总理麻生太郎的妻弟。他曾任财务大臣，被认为对消费税减税态度消极，舆论评价其“存在感薄弱”。

有日本记者指出，更换干事长几乎已成定局。“对铃木俊一工作表现持肯定评价的人寥寥无几。高市早苗1月决定解散众议院时，并未事先与铃木俊一进行沟通与协调。他与首相官邸沟通不畅的问题十分严重。”有消息人士透露，相较于铃木俊一，高市早苗更信任负责实际事务的干事长代行萩生田光一。萩生田光一曾是昔日自民党最大派系“安倍派”的核心操盘手。舆论推测，高市早苗有意撤换铃木，由萩生田光一接任干事长。

但自民党内也有不少声音反对这一构想，如果萩生田光一出任干事长，旧“安倍派”过往的政治资金问题有可能再度发酵。在内阁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当下，如果再叠加负面舆论，很可能会左右地方选举结果。在野党势必会抓住此事大肆攻击，或对明年春季地方选举造成负面影响。除此之外，一旦出现“撤换铃木干事长”的局面，一直支撑执政的日本前首相、自民党副总理麻生太郎，也有可能选择与党内根基薄弱的高市阵营拉开距离。

营拉开距离。

《读卖新闻》报道称，高市早苗8月25日在首相官邸与麻生太郎共进午餐，会谈时长约50分钟。据推测，二人围绕拟于9月末实施的内阁改组、党内高层人事安排交换了意见。铃木俊一在同日的记者会上谈及内阁改组与党内高层人事安排时表示：“我认为相关人事安排很快就会得出结果。”

影响中长期政策

据多家日媒8月21日报道，日本维新会预计派人入阁，现任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几乎确定留任，而高市早苗去年竞选自民党总裁时的4位对手，其去留问题也成为关注焦点。

自去年10月起，日本维新会以“阁外合作”方式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如今即将派人入阁，是高市早苗为稳固政权所作出的布局。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维新会希望获得的职位包括负责副首都设置相关事务的阁僚，以及管辖地方自治事务的总务大臣等。

据《产经新闻》报道，木原稔深受高市早苗信任，几乎确定留任。为保障2027年度预算案年底前顺利编制出台、推进“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核心政策落地，财务大臣片山卓

月续任概率极大。

有日媒指出，高市早苗的自民党总裁任期仅剩一年，围绕“后高市时代”接班人的博弈已经在台面下悄然展开。现任总务大臣林芳正、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自民党政调会长小林鹰之4人，均是高市早苗去年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对手，他们是否续任也成为关注焦点。

《产经新闻》报道称，中东局势与对俄外交正处于关键阶段，且年底即将修订“安保三文件”，高市政权内部普遍认为，负责外交的茂木敏充及负责安保事务的小泉进次郎留任的可能性极高。

《读卖新闻》则指出，小林鹰之始终秉持支持高市早苗的立场，在先前的特别国会中，针对《皇室典范》修正案等议题，为协调党内各方奔走。作为保守派，小林鹰之在4人之中的政治立场与高市早苗最为接近。作为未来的首相接班人选之一，亦有呼声要求让他担任重要阁僚职位。而日本政府内部人士透露，林芳正已经开始为一年后的选举布局，并有意在现阶段和首相拉开距离。

分析指出，此番酝酿中的人事更迭绝非普通的内阁洗牌，而是高市早苗在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执政压力加剧背景下作出的一场政治豪赌。

□ 本报记者 王艺茗

8月13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披露，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2日签署的《扩大打击跨国网络犯罪能力》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美国私营企业可在联邦项目管控下，运用网络工具监控境外网络犯罪活动，破坏相关犯罪网络。多家美媒对此举措表示担忧，认为其极易引发网络空间混乱。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方此举严重威胁他国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冲击现行全球网络治理规则，破坏网络空间整体秩序。

重大政策转向

美媒分析指出，这项新规标志着美国网络安全策略出现关键性调整，原本由执法、情报、军事专属的网络作战权限，首次向私营商业主体开放。

根据最新备忘录内容，美国国土安全部将依托下属工作组——国家协调中心搭建并统筹相关专项机制，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共同承担监督职责。经过官方审查备案的私营企业，可正式参与联邦专项行动，与各级政府机构、行业主体共享网络威胁情报，拟定处置方案。

获批企业可开展两类合规行动：一是网络监视行动，精准识别境外网络犯罪主体与活动轨迹；二是网络效应行动，通过技术手段阻断、降级、瘫痪境外犯罪系统。新规明确，行动对象仅限境外跨国网络犯罪组织，严禁针对主权国家政府。所有私营主体的跨境网络操作，必须提前取得政府书面授权，并缴纳不少于100万美元的保证金或托管资金。同时，备忘录划定红线：相关操作不得造成人员伤亡、重大人身伤害，严禁触发国际法界定的武力使用或武装攻击行为。

《纽约时报》评价称，这是美国数十年网络安全政策的重要拐点。美国网络战略自此告别单纯防御模式，走向“网络私掠化”新阶段。国家主体与私营主体、合法执法与黑客攻击的边界被刻意模糊，为全球网络治理埋下巨大隐患。

政策酝酿已久

事实上，允许私营部门参与进攻性网络行动的设置，在美国政界、业界酝酿多年。过往多届美国政府均未公开认可该模式，核心顾虑在于，私营主体跨境网络行动极易引发跨国网络冲突，让美国企业陷入国际法追责风险，衍生一系列不可控的连锁后果。

2025年8月，美国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众议员戴维·施布克特向国会提交一项法案，提议授权私营实体打击境外网络犯罪组织，直接将大航海时代的“私掠者”概念移植至网络空间。2026年3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提出“释放私营部门能力、瓦解对手网络体系”的战略导向。当月6日，美国签署第14390号行政令，部署全国范围打击网络欺诈专项行动，层层铺垫，为此次备忘录落地扫清制度障碍。

有分析指出，持续高发的大本网络安全案件，成为政策转向的现实推手。美国联邦调查局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民众上报的网络犯罪损失接近210亿美元，同比增幅达26%。白官统计清单显示，2025年美国消费者遭受的网络犯罪损失超208亿美元，超七成美国成年人遭遇过网络诈骗或网络攻击。拜登政府时期负责军事网络武器应用监督的前五角大楼官员米克·欧坎坦言，当前高频次的网络对抗作战节奏，已让美军官方力量难以持续支撑，而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或将进一步加剧网络攻防压力。

风险全面凸显

在立法试探，战略铺垫与现实压力等多重因素的助推下，美国正式将争议极大的“网络私掠”模式落地为国家政策。但该政策自公布以来，争议与质疑从未停歇，潜在风险持续凸显。

曾服役于美国网络司令部的前军官安德鲁·肖卡直言，新规最核心的隐患是催生大量不受统一管控的“网络私掠主体”。联邦层面统筹协调网络行动本就难度极大，引入数量庞杂、诉求多元的私营企业后，整体管控难度将呈几何级上升，极易出现无序作战、越界行动等乱象。

网络安全企业Veracode联合创始人维索帕尔进一步预警了实操风险：私营企业受官方授权开展跨境网络打击，一旦操作失误，后果难以预估。为打击境外间谍团伙入侵境外数据中心，极有可能误伤当地医院、民生基础设施等无辜主体。同时，参与项目的企业人员跨境出行时，大概率会被目标国认定为非法网络攻击者，面临被捕、审讯风险。

除此之外，该备忘录的法律效力尚未经过司法检验，存在被法院推翻的可能。一旦政策被判定无效，参与行动的私营企业将面临追溯性刑事追责。同时，美国各州计算机犯罪法规、目标国网络安全法律，均未适配此次新规，私营企业始终处在跨界违法的风险边缘。

事实上，美国私营企业长期为本土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搜集、网络作业支撑，已是公开的潜规则。此次新政彻底将灰色操作合法化、公开化，意味着更多美国网络安全企业、情报承包商，将以非国家主体身份，肆无忌惮地开展跨境窃密、网络入侵、系统瘫痪等恶意活动。

业内专家普遍警示，美国正依托自身网络技术与产业优势，将私营企业的技术能力转化为国家博弈工具。这种突破国际规则、放任私人网络作战的行为，不仅会激化跨国网络冲突，加剧国际紧张局势，更可能因目标误判、行动失控，引发灾难性后果。当“网络私掠”披上合法外衣，全球网络空间的安全底线与秩序准则，将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立法动态

韩国国会全体会议通过犯罪收益没收法案

韩国法务部近日宣布，以引入独立没收制度为核心的《关于隐瞒犯罪所得的规制和处罚法》修正案已获国会全体会议通过。修正案允许韩国检方在确认财产为犯罪所得的情况下，即使由于涉案人员死亡、逃往海外或下落不明等原因导致起诉困难，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没收令。修正案适用于严重危害公共福利的犯罪，例如网络诈骗、非法网络赌博、毒品犯罪、涉及儿童和青少年性剥削犯罪以及网络性犯罪，也适用于包括暴力、外患、内乱等犯罪。

新西兰拟立法禁止16岁以下使用社交媒体

当地时间8月24日，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政府当天向议会提交一项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据悉，该法案将要求社交媒体平台采取合理措施核实用户年龄，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此外，法案还提议对违规平台处以最高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该法案还需经过多个阶段，得到议会通过后才可成为新的法律并生效。多家媒体报道指出，法案能否最终落地仍存变数。执政联盟中的行动党以及优先党均公开表示反对。

德国将废止“陪伴饮酒”规定保护未成年人

据德国媒体报道，为更好地保护青少年免受健康风险和酒精成瘾风险的侵害，德国将废止在成年人监督下的“陪伴饮酒”规定。联邦内阁已批准家庭部部长普里恩提出的相关法案。接下来，联邦议会将对法案进行审议。此前，只要有父母在场，德国未成年人可以饮用啤酒和葡萄酒。如今，德国联邦政府正在酝酿废除相关法规。普里恩希望借此降低14岁和15岁青少年的酒精成瘾风险。在德国，在公共场所消费和销售啤酒、葡萄酒、气泡酒或其混合饮料的法定年龄下限设置在16岁。不过《青少年保护法》第9条规定了目前唯一的例外情况，即14岁和15岁青少年可在监护人陪同下饮用上述酒类。

（本报记者 吴琼 整理）

假酒案频发 印度地下酒精产业链顽疾难除

□ 本报驻斯里兰卡记者 韩博

印度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多人死亡。事件再次暴露出印度地下酒精产业链积弊难消的现实困境，也引发印度社会对非法酒品生产销售及监管问题的广泛关注。

再现假酒中毒惨案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8月21日，古吉拉特邦多名居民饮用非法酒品后出现中毒症状，检测确认涉事酒品含有甲醇。截至目前，这起事件死亡人数已升至13人。2022年，古吉拉特邦就曾发生含甲醇非法酒品致人死亡事件，当时遇难人数超过40人。

事件发生后，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要求古吉拉特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厘清死亡人数、伤员救治、责任追究以及防范同类事故的举措。印度媒体称，该委员会此举意在倒逼地方政府压实责任，防范悲剧重演。《印度时报》援引警方初步调查称，涉事非法酒品掺入甲醇等有毒物质，办案人员正在追查原料来源与非法生产网络。

古吉拉特邦是印度少数实行严格禁酒的邦，当地法律规定，除特殊许可外，酒类的生产、销售、消费均受到限制。但多年来，非法酒品交易始终屡禁不止。本次事件再度引发印度社会对禁酒政策实效、非法酒品监管以及基层治理能力的讨论。

假酒中毒致死并非古吉拉特邦独有。近些年，比哈尔邦、泰米尔纳德邦、阿萨姆邦等地都出现过饮用非法酒品致人伤亡的案例。印度部分媒体认为，假酒已经成为牵涉公共安全、社会治理与基层监管的长期性难题。

顽疾为何屡禁不绝

印度假酒事件频发，是酒类管理制度、消



印度古吉拉特邦8月21日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多人死亡。而在2022年古吉拉特邦就曾发生过饮用含甲醇非法酒品致死事件。

费习惯、非法供应链、监管体系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印度实行联邦制，酒类管理主要由各邦自行负责。出于公共健康与社会治理考量，部分邦推行限酒、禁酒政策，古吉拉特邦的禁酒传统由来已久。现行禁酒法律源自1949年《孟买禁酒法》，行政区划调整后继续在当地适用。比哈尔邦也于2016年全面实施禁酒。

但禁酒并未彻底消除酒精消费。《今日印度》援引印度第六轮国家家庭健康调查数据显示，比哈尔邦实施禁酒之后，2023年至2024年度仍有约165万的15岁以上男性存在饮酒行为。报道认为，行政禁令难以短时间扭转部分地区根深蒂固的饮酒习俗。

推行禁酒的邦，非法酒品中毒事件依旧时有发生。《印度时报》此前报道称，比哈尔邦禁

酒之后，地方政府长期面临非法酒品走私、售卖带来的执法压力。现实表明，管住正规酒类市场，并不能根除地下非法酒品。

甲醇中毒是假酒致人死伤的核心诱因。甲醇属于工业化学品，人体摄入后毒性极强，可造成视力损伤、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印度多起假酒案中，涉案酒品均检测出甲醇。

2024年泰米尔纳德邦假酒中毒案造成多人死亡，《印度快报》披露，送检非法酒品样本中检出甲醇。更早的2019年，阿萨姆邦、北方邦、北阿坎德邦等地也发生过假酒中毒事件，引发全国关注。

非法酒品产业链高度隐蔽，则进一步加大了监管难度。假酒生产涵盖原料采购、加工、包装、运输、分销等多个环节，不少窝点散布在基层乡村，执法部门很难及时发现。